



7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

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

社会、政治与思潮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

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1

ISBN 7-201-03681-5

I. 近… II. ①南…②南… III. 历史-研究-中国
-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82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宏瑞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字数:392 千字 印数:1-1,000

定价:25.00 元

序 言

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得以迅速扩张,以前相对隔绝的中西文化,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不期而遇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融合,致使近代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古典中国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受到挑战,使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明确的现代化趋势,也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因此,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的研究,就凸现出极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南开大学历史系开风气之先,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率先倡导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后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多年来也致力于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政治与思潮进行研究。1984 年成立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1999 年底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一直以推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为宗旨。1999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办了“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学界群贤毕至,共襄盛举。此次会议参加人数较多,论文质量较高,讨论也很热烈,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潮等专题,是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与会专家来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学科,他们有的人就中国农村的灾荒、村政、铁路建设、禁烟、农村救济、绅士、土改及当代社会阶层变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人对清末皇族内阁、农民结社、1946 年 2 月的反苏运动、农村土地所有权变化、现代中国法制建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人对清末留日学生与翻译、公民和政党意识、城市民众观念转化、胡适思想源流、社会主义思潮传播、学衡派文化观进行了分析。涉及面之广泛、讨论问题

之具体都极有特色。

由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杂志篇幅所限,无法容纳全部国际会议的论文,遂将述及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与思潮内容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以向学术界和社会展现此次国际会议的丰厚成果。

会议召开前,曾对入选论文做过一定的筛选。此次编辑过程中,个别论文由于已公开发表等种种原因未能编入。由于篇幅所限,论文集编辑组只对一些内容较长的论文进行了文字压缩,作者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充分尊重。相信读者自会从中体味不同的风格、观念与思考,如果能够有所启发,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目 录

中国农民和近代革命	张守常(1)
清末至抗战前中条山地区的“三大灾祸”	杨圣清(11)
辽宁近代商品流通市场体系的初成	张利民(19)
晚清至民国年间东北铁路建设与新兴城市的崛起	杨 琪(41)
阎锡山执政时期的山西村政建设述评	李茂盛(51)
《吴宓日记(1910—1948)》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	李玉梅(63)
南京国民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政策述评	王金香(76)
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金融救济受益阶层分析	于 永(88)
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问题述评	张洪祥 李庆刚(95)
建国前夕华北新解放区农村的社会面貌	
——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均产”的政治	
共同体	[韩]尹辉铎(111)
地富成份划分考	[日]滨口允子(121)
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知识因素分析	陈学峰(138)
全球化之外	
——20 世纪中国的个人与	
社会(节译)	Kurt W. Radtke(黎德机)(151)
皇族内阁新论	王玉国(167)
试析“丁巳复辟”破产后清室优待条件未遭废除的	
原因	郭呈才(180)
试析豫西天仙庙道的反政权性	乔培华(189)
抗战时期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演变	[日]三好章(197)
晋北察南抗日根据地对土匪联庄的收编改造工作	祁建民(210)
1946 年 2 月反苏运动述评	纪亚光 江 沛(216)

论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之变迁	左志远(238)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	田酉如(249)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期人民公社体制剖析	
——以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个案	崔伟(258)
我看“文化大革命”延续十年的原因	何广中(284)
雷铁崖与清末社会思潮	周术槐(290)
“汉学”异端与清末学潮、政潮	吴雁南(300)
清末留日学生与翻译	周德喜(310)
公民意识、政党与近代中国社会	刘健清(319)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市民社会观念变动评析	姬丽萍(335)
达尔文主义对民初知识界的影响——以胡适思想	
为例	黄焯钧(350)
五四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问题探析	徐行(358)
从青年恽代英思想的新生看新文化运动的流变	田子渝(370)
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观点	[韩]李炳柱(381)
论学衡派文化观中的道德主义内核	周云(398)
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新文化运动	魏宏运(409)
论中间派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探究	魏继昆(4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思想评析	度平(435)
后记	(448)

中国农民和近代革命

张守常

内容提要:本文以宏观视角对近代以来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觉醒、地位、作用进行了高度提炼。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中国农民由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而逐渐发展出民族、国家意识,以自身的力量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历史证明,没有先进的思想作引导,农民难于超越自身局限。

关键词:农民 近代革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国。近代有四亿或四亿多,以通常估计 80% 是农民来说,中国有三亿多农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阶级集团,人多力量大,它有条件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主力军。

但是,中国农民是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小生产者,这就使得他们分散、贫穷、缺少文化知识(所谓愚昧),只看到眼前与己有关的一点小利(所谓自私),看不到大局。因此,发动他们,组织他们,很不容易;发动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更不容易。中国近代革命,是经过一百多年曲折艰险的斗争,失败,再斗争,才最后取得胜利的。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农民的反应是迟钝的。近代初期的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农民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有广州近郊的三元里,那是因为广州城内的英国侵略军下乡去骚扰,才激怒乡民群起而攻之。在其他地方,间或有个别的小型抵抗行动,较成规模的群众性斗争就没有了。

对于帝国主义的人侵,当时中国农民,距战场远的甚至全不知道,知道的也不怎样关心,认为那是官府的事,皇上的事;至于签订的

什么不平等条约,就更知道了,即使知道一点,也不理解和自己有什么利害关系。更不懂得,面对外来的民族敌人,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相反地,他们正乘皇上和官府有外来麻烦时,起来反抗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统治。

我们且看这样的情况:当鸦片战争打到浙江沿海的时候,在浙东诸暨,“往岁辛丑(1841)西夷犯甬东,越氓多乘机掳掠为生”;^①同年九月,余姚有人“倡言乱世不管输租”,多有应之者,“扰攘一时”;^②再看浙西吴兴,“是年英夷入犯……巨头村民嵇竹堂建黑白旗聚众抗粮,势若叛逆,大府调兵围剿,始伏辜。”^③

再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情况:“庚申(1860年),英法联军犯京师,车驾出狩热河,畿南土匪蜂扰……冀州王洛悦、河间贾滢、刘四等,各麇集千余人,树旗起事,纵横数县,莫撓其锋”;^④咸丰“十年秋,圣驾北巡,人心风鹤,博野萧家杨村萧三等纠众四五百人,在左近各村焚烧抢掠”;^⑤献县,“值文宗北巡,奸民乘机抢掠”,^⑥等等。到这年初冬,咸丰皇帝仍躲在承德的时候,胜保曾上《请回銮疏》,说道皇帝若不回京,则使“弱者怨嗟,强者覬觐,祸乱之渐,不可不防。即如直隶现在征收夏忙地丁,民间咸以回蹕无期,别存意见,各属钱粮延不完纳。愚氓无知,举国若狂。”他害怕“此时犹为观望,将来激成厉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年如此,来年更甚”。^⑦

果然,翌年(1861年)春,当咸丰皇帝在热河仍未回京的时候,山东西北部的白莲教公然自立皇帝,武装造反,并波及直隶南部一些地区。

总之,在近代初期,广大农民急于要反抗的是封建压迫,外来侵略造成的民族矛盾没有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激化的速度大。“依据《东华录》道光二十年至二九年(1841年至1849年)所记关于汉、回、番、瑶各族起义及骚动事件,九年中凡一百十次。二七年最多,凡二十六次。二八年十次。二九年十六次。二九年以后不是事件减少,而是事件太多,地方官吏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⑧

在社会比较稳定的所谓“承平”时期,即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农民的希望是做地主。有的农民由于某些条件好,如劳动力好,又善于经营,会逐渐富裕起来,添购土地成为富农、地主。只是能得如此上升的,在农民中是很个别的少数。然而毕竟有此实例,便成为农民所能期望的目标,此外,他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实际上多数农民家道日窘,不得不出卖其仅有的小块土地。“承平”时代人口增生,土地又逐渐向地主手里集中,于是在农民这方面说,人丁多了,而土地减少,甚至完全失去土地。他们谋生艰难,有的连做佃农、当长工,以维持最低生活的机会都得不到了。以合法手段维持生活都不行了,只能采取非法手段:偷、抢、结伙劫掠,大群体地造反。这时他们已不再想个人发家致富当地主了,他们大多抱有的是公产共享,平均主义的思想了(也可以叫作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洪秀全创拜上帝会,宣传天父皇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也创造了人,世界上的财富都是皇上帝的人,人都是皇上帝的儿女,都有权享用世上的财富。“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原道醒世训》)。“务使天下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主张正符合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于是信奉者众多而且虔诚,有信仰才能自觉地守纪律,于是,金田“团营”,太平军异军突起,他们的组织性和战斗力,显然比并世其他结伙造反者强出许多,很快便冲出广西,直下两湖三江,定都天京,北伐西征,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即令实行,也得不到积极效果。一百多年后一度实行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实践证明,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太平天国后期,由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把从香港传教士那里得知的西洋资本主义模式罗列出来,而中国当时尚无资产阶级,这是一种超前的方案,也引不起广大农民的反应。太平天国把农民发动起来了,却找不到农民的出路。而在“承平”时那种想当地主的愿望,却变态地或说畸形地“实现”了,天王成了高居深宫的封建皇帝,众多封爵将军成为封建贵族,贪图享受,脱离群众,遂导致最

后失败。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拜的是从西方引进的洋上帝。在他的家乡广州府地区却传不开，因为这里有三元里起义和反进城斗争的影响。到广西就传开了。广西是广东的邻省，但当时的农村是信息的不良导体，广东的反洋人斗争还影响不到广西。至于从广西到南京的两湖三江地区，离海岸更远，反洋人斗争的影响更到达不了，也就更少对拜洋上帝的心理障碍。所以太平天国初期会有那样的飞跃发展。

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抵抗外敌的民族意识，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而逐渐觉醒的。若具体些说，农民的反侵略觉悟主要是通过教案即反洋教斗争而激发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历史大国，胸怀宽阔，气魄恢弘，自古以来就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并不排外。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是泛神论，对于外来宗教，不论是来自什么国的什么神，都可以供奉膜拜。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早已传入中国，特别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信仰，几乎已不觉得是外来宗教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稍差于前二者，唐代已传入，但无大发展。从明中叶以后，随着西欧海上远航的发展，西方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直到清前期，他们在各地传教。从利玛窦到北京（1610年）起，有一些西方教士且在中国的首都乃至宫廷供职（至今北京车公庄还存有他们一些人的墓碑）。后来罗马教廷一再纠缠，要求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这是干预中国的内政，康熙皇帝为此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⑨虽有禁令，并不严厉，嗣后时禁时弛，仍有西洋教士来中国活动。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6月统计，“天主教在中国各部十三省活动，欧籍教士有六十五名，天主教徒约有三十万人”。^⑩但是并未发生像近代那样的教案，因为这时西方国家尚未能侵入中国，中国尚是一个独立大国，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尚不敢有什么越规行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宣布撤销对于天主教的禁令，洋

教士可在通商口岸传教,而他们有不少人便已潜入内地活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教士的活动就更放肆了。根据新签订的条约,洋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根据法国教士擅自在条约中文本中增添的他们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①他们到处占地建堂,或随意指认某地是他们从前的“教产”,“硬要给还”,或强买硬索,诈骗兼施,不择手段,在近代来到中国内地开始其传教活动的时候,便已使得“百姓怒目眈眈,视同仇讎”^②了。

民间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纠纷和冲突,甚至至于涉讼,但那也不过是一般的民刑案件。但若涉及教民,那么洋教会便插手干预,包庇教民。地方官若不偏袒教会,洋教士便上报该国驻华公使,公使找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清政府便指示该省督抚向该州县官施加压力,结果总是教会得逞。这样就使得洋教士愈加放肆,不法教民也就愈加仗势作恶,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批倚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兴起的洋恶霸,这样就必然激起中国广大人民强烈的愤恨和反抗。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洋教会横行霸道,甚至直接欺负到自己头上来,而官府不给民作主的时候,冤愤莫申,便自己起来干,进行反击,这就是教案。

初期教案,往往是在各省各地分散爆发的个别的孤立的事件,此伏彼起,无何联系。后来到中法战争时期,从西南边境到东南沿海各省各地一连串发生的教案,很明显地是和反对法国的侵华战争相联系的。到中日甲午战争和继之而来的瓜分风潮时期,反教会斗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相联系就更为明显了。他们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依恃武力强加给中国的“和约”的侵略性质:“最恨和约,一误到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③

初期教案,往往是为反对洋教会本身的恶行而反对洋教会。而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日益深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④这就摧毁了广大内地农村的家庭工业和手工作坊。人们也

日益认识到随洋教会俱来的洋货,也是造成农村破产农民更加贫困的祸根。所以在反洋教斗争中日益有了反洋货的内容,以至义和团兴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⑮

初期教案,大多是各地官绅公开带头或暗中支持的。后来,随着反教会斗争的日趋激烈,官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不但不敢支持反教会斗争,反而往往偏袒教会;地方绅士顾惜身家,在斗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也往往软化,退出。斗争的主力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大足教案的余栋臣,梨园屯教案的赵三多、阎书勤,可谓农民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代表。

于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人数最多的农民,从个别的、分散的反对洋教会和洋教士的斗争中,几十年间积累了反复多次的经验,逐渐认识到要更全面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对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瓜分风潮,不再像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那样不大关心,而是看到了摆在眼前的民族危机,有了害怕国亡家破的危难意识,有了救亡图存的迫切感。“上下之人举以为忧”,群求发奋自强之道,“于是君子谋于朝,小人谋于野”。^⑯在野的劳动人民,便要反洋教,反洋货,反洋人,归结为“灭洋”。

至迟在 1894 年,从皖北到山东的大刀会活动地区就已喊出“兴华灭洋”的口号。1898 年四川大足余栋臣提出“顺清灭洋”口号,其影响遍及邻近各省,皆有此口号出现;山东冠县赵三多提出“助清灭洋”,以及直鲁交界各地的“保清灭洋”、“辅清灭洋”,最后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统一为“扶清灭洋”。对清政府“顺”之,“助”之,抑或“保”之、“扶”之的提法有所不同,对“扶清”、“保清”是扶保清朝政府,还是扶保大清国即中国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灭洋”是一致的,毫无疑义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流传很广的一件揭帖中有一句切中要害的话“只因鬼子闹中原”,所以群起“灭洋”。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其中主要是农民,到 1900 年所得到的共识(虽然还有其认识不够科学的弱点),从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前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农民阶级最大的两次革命集结。洪秀全时期,他用拜上帝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若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用拜上帝会是发动不起来的;若按义和团的标准,像洪秀全这样带头拜洋上帝的人,反而是特大号的“二毛子”,是打击的对象。从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标志着中国亿万农民,从只知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压迫或以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转变为以反抗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为主,从不太理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转变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们经过四五十年的实践,经过几百次教案的斗争,才取得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或说提高。中国农民一旦有了这一共识,就会形成非常巨大的爱国主义力量,中华民族就有了摧不垮的保证。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的最高峰,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

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的投降、义和团的被出卖,人们进而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变而为“扫清灭洋”。先在 1901 年夏,直隶深州、安平一带倡立联庄会,“旗上书‘扫清灭洋’字样,比去夏拳匪尤为猖獗”,^①“共有七百余庄,约二十万人”。^②同时在四川出现有“灭清剿洋兴汉”字样的揭帖,^③斗争一度高涨。1902 年春天到夏天,直隶南部广宗、巨鹿等直鲁豫交界地区,有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1906 年春,河南西平苗金声起义,也打出了“扫清灭洋”的旗号。^④这是从义和团被清政府出卖和镇压的血的教训中所得的认识。他们终于自发地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联系起来了。这标志着中国农民的认识继续向前发展,是清王朝迅速瓦解的重要因素,是集中目标于推翻满清政府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辛亥革命前的若干年间,各地农民群众的抗捐、抢粮,以至暴动等“民变”,几乎是到处发生。只是在辛亥革命当时,他们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有力领导。

同盟会中最激进的主要是留日学生,他们大都是世家子弟,最差

的也是败落的士绅地主家庭的子弟，他们并不理解或体会农民的艰难生活及其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他们大多还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愚昧无知，不足以与语大事。他们忙于武装起义，甚至不怕牺牲亲自上阵，但却不知道向农民群众中去寻找力量。

中国的“纯”资本家不多，绝大多数是刚从地主、绅士、官僚转化来的，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还同时就是地主，不能指望他们会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形势下，有的地方农民自发地起来造反。例如晋东南长治、高平、沁州、沁源等地农民的“干草会”，聚众进城，仇绅抗官。^①这时太原已宣布独立，成立了军政府，这个革了命的军政府却应士绅之请派兵来镇压了“干草会”，擒拿为首者“枭首示众”。^②另在陕西西乡县，一支农民队伍“保民团”占领了县城，也被士绅请汉中镇总兵派兵来镇压了，所不同的是，来的是原清朝的官兵。^③类似情况，在其他各地还有一些。

总之，辛亥革命未能把农民这一最大的阶级力量吸收进来，就显得那么软弱无力，虽然推翻了清朝，但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中国的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他来自农村，又深入农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号召革命党人“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他豪情激越地宣称：“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网罗，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对中国农民中间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最早的最充分的评估。

不久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开辟了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开始了长期的由无产阶级领

导的农民战争,走上中国革命惟一能够取得胜利的道路。

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认识到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后者在近代革命中的主力军的作用,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发动他们,领导他们,和他们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官僚资本的最后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释:

①姚燮:《周虚谷传》。见宣统《诸暨县志》卷51,第27页。

②光绪《余姚县志》卷12,《兵革》引《半读书屋笔谈》。

③杨岷:《藐叟年谱》,第4页,附在《迟鸿轩集》之后,民国二年刻本。

④夏孙桐:《大父易州公事略》,见《观所尚斋文存》卷7,第3页,民国二十八年排印本。

⑤汪士铎:《记李太守事》,见《汪梅村先生集》,《文集》卷7,第4页,光绪初年刻本。

⑥秦福和:《秦聚奎行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原稿本。

⑦《胜宫保奏议》,第2~3页,时晴斋主人编刊本。

⑧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93页,1951年修订五版。

⑨《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4通《教王禁约译文》后之硃批,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出版。据同书第13通《康熙硃笔删改嘉乐来朝日记》,此硃批之日期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⑩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7页。原注,据《中国丛报》1844年1月,第595页。

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7页。

⑫总理衙门《致各国大臣书并章程八条》,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八条。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59,第6~7页,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⑬《刘伯温碑文》,原见寄生编《庚子并蜂录》下卷,第3页,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光绪二十六年稿本。此据陈振江、程歆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⑭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转引自孔令仁:《十九世纪末山东的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411~412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⑮日本佐原笃介、浙东汪隐同辑《拳事杂记》,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⑯唐晏:《庚子西行纪事》,见《义和团》第3册,第468页。

⑰储仁逊:《闻见录》,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条,天津人民图书馆藏稿本。

⑱《汇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⑲《巴县档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川东道给巴县知县密札的附件,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61页,《灭清剿洋兴汉帖》。

⑳民国《西平县志》卷38,第1~2页,《故事志·匪劫篇》。

㉑参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上党干草会运动》,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㉒民国《沁源县志》卷6,第9~10页,《六事考》。

㉓薛祥绥纂修民国《西乡县志》第5册,《大事志》,第35~36页。

(张守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